

藏、汉族儿童规则意识形成的比较 及其对教育的启示

范春林

(四川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 成都 610068)

摘要:儿童规则意识与遵守规则习惯的形成,是儿童社会性发展的基本内容,也是儿童社会化成功的标志之一。人的发展生态学理论认为,个体的发展是个体与其成长的生态环境交互作用的结果。本研究选取小学四、五、六年级四川藏区学生349名、汉族地区学生541名,通过问卷调查,发现藏族儿童规则意识总体得分和规则情感、规则意向得分显著高于内地汉族儿童,汉族儿童规则认知得分显著高于藏族儿童。为理解儿童规则意识的特点与其社会文化生态的关系,本文以人的发展生态学理论为基础,具体分析了藏、汉族儿童所处的独特的区域性宏观环境与微观环境的差异及其对藏、汉族儿童规则意识的不同影响,并依据研究结果,提出了儿童规则意识的教育策略。

关键词:儿童;规则意识;人的发展生态学理论;跨文化研究

中图分类号:G61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5315(2012)06-0023-08

社会规范是人类和谐发展的基石,是人类自由、公平、正义等价值实现的基本保障。人类个体和群体的行为和活动都需要各种社会规范的调节。遵守规则是社会对个人的基本要求,也是现代人的基本素质。当前,中国社会正进入转型时期,人们生活在价值多元的文化生态中,追求个人自由与遵守社会规则的矛盾愈显突出。人们追求个性独立、权利保障与行为自由的愿望和要求日益强烈,而对规则的遵守则较为淡漠甚至无视,社会生活中的失范现象较为严重。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如何促进个体规则意识的形成和发展,越来越受到学术界和教育实践部门的关注。

儿童规则意识与遵守规则习惯的形成,是儿童社会性发展的基本内容,也是儿童社会化成功的标志之一。人的发展生态学理论提出,儿童的发展是

儿童与其成长的社会文化生态交互作用的结果^{[1]4-12}。通过跨文化的比较研究,揭示不同民族儿童规则意识的特点与其生活的社会文化生态的关系,可以为教育实践更有效地培养儿童的规则意识提供重要的理论依据。

一 文献综述

(一)研究现状

社会规范或社会规则(social norm)是多学科的研究课题。哲学、社会学、人类学、法学、经济学等多从社会规范的本质、起源、演变、存在形式及功能等角度展开研究,而心理学则主要研究个体与群体规范的形成,人们在社会生活中如何运用社会规范去调节自己的行为,以及由此表现出来的行为方式及行为特点。目前,学术界围绕社会规范与规则意识进行了以下探讨。

收稿日期:2012-03-20

作者简介:范春林(1965—),四川岳池人,教育学博士,四川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学习与教学、儿童青少年社会性发展。

一是关于社会规范的含义。广义来说,社会规范指整个社会和各个社会团体及其成员应有的行为准则、规章制度、风俗习惯、道德法律和价值标准。狭义来说,社会规范指群体规范,即指为保障群体目标的实现和群体活动的一致性,建立起的约束群体成员共有的行为规则与标准^[2-3]。

二是对社会规范功能的分析。社会规范是人类社会自身发展的需要,是社会运转的一种自行调节机制。社会规范是协调社会关系的需要,是形成社会共同目标与价值的需要,是社会成员社会化的需要,也是惩治反社会行为的需要^[4]。

三是对影响规则意识形成的因素的探讨。有研究者分析了中西方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宗教对规则意识形成的影响,认为规则意识的培养与确立,与一个国家的文化传统、宗教信仰有着不可割舍的渊源。西方宗教的道德戒律为其民众规则意识的确立助了一臂之力,而中国儒家学说却起着较明显的阻滞作用^[5]。

四是对国人规则意识缺乏的原因的探讨。研究者提出“服从命令”与“尊重契约”之间的规则认同差异,命令式规则使中国人缺乏规则意识,而契约性规则则是其他许多国家国民尊重规则的根本原因。当规则是依赖“强者的管制逻辑”建立起来,而不是依赖内在的权利平等、程序正义、公正执行,不是依赖市民自治、公共契约的理念建立起来,规则就难以得到自觉遵循^[6]。另有研究者从社会环境的不良影响,规范、制度本身的缺陷,学校与家庭教育的偏差,个体价值观扭曲等方面,分析了青少年规则意识缺乏的原因^[7-9]。

(二)对已有研究的简评

现有研究存在的主要不足有如下四点:一是缺乏对规则意识的内部心理结构的科学分析和理性建构;二是研究者往往针对一般公民的规则意识进行研究,对处于规则意识形成关键期的儿童的研究还很少见;三是研究方法还基本停留在经验描述和理论思辨上,有待规范和完善;四是部分研究涉及到文化背景对规则意识的影响,但主要是我国与国外的比较,国内不同民族间的跨文化研究还很少见,对影响规则意识形成的因素的系统研究也很少见。探明影响因素,并通过对其有效干预以增强个体的规则意识,是未来研究亟待加强的一个方向。

二 问题提出与研究设计

(一)研究问题

1. 规则意识的含义及结构维度。
2. 藏、汉族儿童规则意识的总体特点和不同维度的比较。
3. 影响藏、汉族儿童规则意识形成的家庭、学校和社会文化因素。

(二)研究假设

1. 规则意识的结构维度包括规则认知、规则情感和规则意向。
2. 藏族儿童规则意识显著高于汉族儿童。
3. 藏、汉族儿童规则意识的差异与两个民族儿童成长的社会文化生态有直接的关系。

(三)研究方案

1. 研究思路与方法

当前,生态化原则已成为发展与教育心理学研究中普遍遵循的方法论原则。本研究拟在生态学原则的指导下,具体考察藏、汉族儿童所处的民族文化传统及其家庭、学校、社区等环境变量对其规则意识形成的影响。

研究方法采用问卷调查、访谈和田野观察等量化研究和质性研究相结合的方法。

2. 研究对象

选取四川藏区两个县县城和乡中心小学各一所,四、五、六年级各1个班,共12个班、376名学生进行问卷调查,回收问卷376份,剔除回答不完整和明显不认真回答的27份,有效问卷349份。另外,选取四川汉族地区两个县县城和乡镇小学各一所,四、五、六年级各1个班,共12个班、619名学生进行问卷调查,回收问卷619份,剔除回答不完整和明显不认真回答的78份,有效问卷541份。

表 1. 藏区有效被试构成情况

	男	女	合计
四年级	68	60	128
五年级	52	60	112
六年级	57	52	109
合计	177	172	349

表 2. 汉族地区有效被试构成情况

	男	女	合计
四年级	95	92	187
五年级	93	85	178
六年级	81	95	176
合计	269	272	541

三 研究结果与分析

(一) 儿童规则意识的结构

在参阅文献和实地调查的基础上,我们将规则意识界定为个体对社会行为准则的认识、体验和遵循意向等心理要素的总和;设想规则意识由规则认知、规则情感、规则意向三个维度构成。为了验证规则意识三维度构想的合理性,我们编制了测量问卷,并采用验证性因素分析的方法考察问卷的结构效度。下面具体介绍测量工具的开发过程。

1. 问卷的编制

第一,文献检索与综述。研究者对社会规范的相关研究文献进行了检索和综述,在此基础上,初步确定了问卷的基本维度和项目。

第二,现场观察和访谈。围绕初步拟定的问卷,研究者深入到调查对象所在学校对班主任、主管德育的学校领导以及学生进行访谈,了解他们对儿童规则意识的看法。研究者还直接进入课堂、学生食堂、体育场等,观察小学生的规则遵守情况。根据调查结果,进一步修订了初步拟定的问卷项目,最后归纳出小学生规则意识的基本内容。

第三,形成问卷维度和项目。在理论分析、实地调查的基础上,大致确立了问卷的维度和具体的项目,总共编制出 43 个项目。问卷采用 5 点记分,例如,“我讨厌不守规矩的人”共有 5 个选项:“从不这样”计“1 分”;“偶尔这样”计“2 分”;“有时这样”计“3 分”;“经常这样”计“4 分”;“总是这样”计“5 分”。

第四,试测、项目分析与修改。为了考察小学生是否能正确理解问卷题目,我们在汉族地区的一所小学进行问卷试测,参加试测的包括四、五、六年级各 1 个班,共 158 名学生。试测后与 2 名四年级学生面谈,请学生对问卷中的每一个项目说出自己的理解,主要考察学生的理解与问卷编制者的原意是否相符。经初测,对问卷进行了修改,筛选出 38 个项目。

将修改后的问卷在藏区一个县、汉族地区一个县的一所县城小学和一所乡中心校的四、五、六年级各选取 1 个班,共 12 个班、350 名学生,进行了第 2 次试测。经过对题目的区分度、结构效度和内部一致性信度进行分析,最后保留 28 个项目。小学生规则意识各自的维度、含义和样题见表 3。

表 3. 儿童规则意识问卷

维度	项目数	含义及样题
规则认知	12	个体对日常生活、学习和社会交往中的各种规则的知晓、理解和评价。如“我认为向别人承诺过的事情就应该做到”。
规则情感	9	个体对规则重要性及遵守规则的心理体验和态度倾向。如“我讨厌不守规矩的人”。
规则意向	7	个体在现实情境中按规则行事及将规则付诸实践的企图或打算。如“向别人做出承诺后,我总会想到去完成”。

2. 问卷施测

由经过培训的主试利用学生的活动课或自习时间,在教室对被试者集中施测。所有问卷的数据录入计算机,采用 SPSS for Windows(16.0)和 AMOS(16.0)进行数据的统计分析。

3. 问卷的信度分析

问卷总的内部一致性系数(α 系数)为 0.83,三维度的内部一致性系数见表 4。

表 4. 儿童规则意识问卷内部一致性系数

维度	内部一致性系数
规则认识	$\alpha=0.89$
规则情感	$\alpha=0.85$
规则意向	$\alpha=0.82$

4. 问卷结构效度的验证性因素分析

用 AMOS 对规则意识的规则认知、规则情感和规则意向三维度构成的合理性进行验证性因素分析。一般来讲,评价一个模型的合理性时,最常用的拟合指数是 χ^2/df 、RMSEA、GFI、AGFI、CFI、NFI、TLI 和 IFI 等。由于 χ^2/df 受样本容量影响较大,在大样本时几乎所有模型都会被认为拟合得不好,所以本研究主要考虑其他几个指标;GFI、AGFI、CFI、NFI、TLI 和 IFI 的值在 0.90 以上且 RMSEA 小于 0.08 时,表示模型拟合得较好^{[10]154-165[11]70-90}。

我们首先建构了规则意识的三维一阶模型,设定三个维度之间两两相关。该模型各拟合度的指标如表 5 中模型 1 数据所示。但是,该模型显示出三个维度之间的相关较高。我们认为,尽管这些维度间存在明显的差异,但它们可能共同解释着一个更高的维度。因此,我们对小学生规则意识建构了一个二阶结构模型。该模型各拟合度的指标如表 5 中

模型 2 数据所示。从结果可以看出,模型 2 数据拟合较模型 1 优。

表 5. 儿童规则意识结构模型拟合度

	RMSEA	GFI	AGFI	CFI	NFI	TLI	IFI
模型 1	0.056	0.961	0.941	0.932	0.921	0.925	0.932
模型 2	0.051	0.967	0.946	0.935	0.924	0.929	0.937

(二)藏、汉族儿童规则意识的比较

1. 藏、汉族儿童规则意识的描述性分析

表 6. 藏族儿童规则意识及各维度的描述性分析

维度	被试人数	平均数	标准差
规则意识	349	3.95	0.76
规则认知	349	3.78	0.86
规则情感	349	4.15	0.72
规则意向	349	3.97	0.69

从表 6 可知,藏族儿童的规则意识各维度的平均分都在 4 分左右,总的来看,被试的规则意识较强。

表 7. 汉族儿童规则意识及各维度的描述性分析

维度	被试人数	平均数	标准差
规则意识	541	3.71	0.78
规则认知	541	4.07	0.76
规则情感	541	3.65	0.82
规则意向	541	3.43	0.67

从表 7 可以看出,汉族儿童的规则意识各维度的平均分都在 3 分以上,总的来看,被试者的规则意识较强。

2. 藏、汉族儿童规则意识的差异检验

表 8. 藏、汉族儿童规则意识差异的 T 检验

维度	藏族	汉族	t
	(M±SD)	(M±SD)	
规则意识	3.95±0.76	3.71±0.78	3.16***
规则认知	3.78±0.86	4.07±0.76	-3.43***
规则情感	4.15±0.72	3.65±0.82	4.67***
规则意向	3.97±0.69	3.43±0.67	4.88***

注:*** P<0.001。

由表 8 可知,藏族小学生规则意识总体得分显著高于汉族学生,在规则认知维度上的得分显著低于汉族学生,但在规则情感和规则意向方面,藏族学生得分显著高于汉族学生。

(三)藏、汉族儿童规则意识差异的成因分析

1. 分析的理论依据——人的发展生态学理论

美国生态心理学家布朗芬布伦纳(Bronfenbrenner, U.)认为,个体在发展过程中并不是孤立的存在,而是能动地与周围环境相互依赖、相互作用^{[1]4-12[12]}。

根据发展生态学理论,个体发展所依赖的环境要素相互联系,构成由低到高具有层次性的四个子系统。首先是微观系统(Microsystems),指个体亲身接触和参加其中并产生体验的,与之有着直接而紧密联系的环境,如家庭、学校、同辈群体等。其次是中间系统(Mesosystems),指个体所处的两个或两个以上微观系统之间的相互关系,如学校和家庭、家庭与邻居之间的相互联系。中间系统对个体发展的影响取决于微观系统间发生相互联系的数量、质量及程度。再次是外在系统(Exosystems),指个体不直接接触或参与,但对个体产生直接或间接影响的系统,它包括父母的工作单位、学校的领导机构、当地的教育主管部门等。这些部门或机构往往会通过一些规章、政策或不良行为对儿童的心理发展产生影响。最后是宏观系统(Macrosystems),指个体成长所处的整个社会环境及其意识形态背景,如整个社会长期所形成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形态以及社会结构等。以上所述个体所处的三个生态系统均存在于这个宏观系统中。如社会的价值观状况及主流价值体系、民族习俗和道德风尚、人们的教育观念和生活方式等等,都会作用于其他三个系统,进而构成影响个体身心发展的宏观系统^[12]。

人的发展生态学理论对我们理解处于不同社会文化生态中藏、汉族儿童规则意识的形成及其各自的特点有着重要的指导作用。

2. 藏、汉族儿童成长环境与规则意识的形成

尽管藏、汉族儿童同处祖国大家庭中,作为共享层面的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制度相同,但藏区特殊的地理环境、历史文化传统、宗教和习俗与内地相比,还是有着自己鲜明的特点。而地域性的宏观生态环境对微观的家庭、学校、社区环境又有着直接的制约和影响。我们认为,正是藏、汉族儿童所处的独特的、具体的地域性宏观环境及其影响下的微观环境的差异,造成了藏、汉族儿童规则意识的不同。

由于研究者的见识和所掌握的文献资料的限制,在此我们不打算对影响儿童规则意识形成的生

态系统做全面的分析,我们主要集中于对宏观系统和微观系统的影响做一比较分析,并说明它们在藏、汉族儿童规则意识形成中的作用。

(1)藏族儿童成长的宏观社会背景和微观环境

这里所说的宏观环境,是除全国人民共享的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因素外的专属于藏区人民共享的文化要素,特别是宗教和习俗。

从宗教方面来看,藏传佛教的哲学思想和价值体系作为藏族精神文化的主体和核心,引导、影响着藏族文化的方方面面。特别是藏传佛教戒律,作为一种行为准则,既对修行者的个人品行作了严格的规定,又成为调节僧众社会的规则。藏族社会几乎全民信教,佛教的价值观和人生观在社会生活中占主导地位,因此,佛教戒律所规定的行为准则便成为全社会的伦理道德规范^[13]。

其次,从习俗方面来看,藏族儿童从一出生,就深受本民族风俗习惯的影响。藏族风俗习惯与生活息息相关,对藏族儿童社会化的影响表现为儿童的社会认知、情感、行为等都带有民族习俗的深刻印迹,尤其是饮食、服饰、居住、节庆、娱乐、礼节、生产、禁忌等习俗,是儿童日常生活中经常接触并感兴趣的,对儿童的影响很大^[14]。

根据发展生态学理论,个体所处的宏观环境是通过微观环境而起作用的。下面,具体看看藏区的宗教和习俗是怎样通过寺庙、儿童成长的家庭、社区(村落、乡镇)和同伴等,影响儿童规则意识的形成^[15-17]。

①寺庙的社会化作用。藏区的寺庙是社区公共活动的核心场所,一些重大节日及社区活动都在寺庙中举行。由于佛具有彼岸性和非现实性,因此僧人(包括活佛、堪布、喇嘛、和尚)就成了可供人们模仿的现实榜样。僧人在社区中有着较高的地位,对于早期社会化阶段的儿童来说,僧人便是社区塑造的榜样,对儿童的模仿行为产生重要影响。

②家庭。在藏族地区,家庭为儿童的成长提供了一个充满宗教氛围的微观环境。藏族家庭各种具有宗教意义的宗教器物设置,为儿童构筑了一个充满宗教氛围的物理环境。此外,在藏区,民众无论是获取消费生活资料、解决个人生活来源的方式,还是社会交往方式、日常生活习惯,以及时间的利用与支配方式等,都融入了宗教并受其制约与影响。而儿童的社会化即是在家庭中习得这种将宗教生活融入

日常生活之生活方式。

③村落、城镇与社区。社区是藏族儿童除家庭以外最常活动的场所。这就将儿童的活动范围限制在单一的地理空间内,使藏族儿童无法或少有机会接触到这个区域以外的各种新的或不同的环境及影响,可以说,社区及村落或城镇在很大程度上加强和巩固了家庭对儿童的影响。

总之,藏族儿童社会化环境的共同性超越了差异性,宗教因素占据着主导地位。藏族儿童面对的是一个和谐的多重世界、一个相对单一的世界,在这种较少角色冲突与挫折感的环境中,儿童欣然接受了父辈的宗教信仰及以此为依托的生活方式。虽然藏区正被拉入现代化的进程中,但现代观念会在何种程度上将藏族儿童卷入进来,目前尚无法确定。

(2)汉族儿童成长的宏观社会背景和微观环境

目前我国内地(与边远民族地区相对应)正处于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型的过渡时期。转型时期整个社会结构不断加速分化,旧有的社会价值观和社会规范不断受到冲击,这就使得青少年在社会化的过程中无所适从、迷失方向,从而带来早期社会化的困境。此外,社会转型带来城市化进程加快,大量农村人口,特别是青壮年劳动者向城市集中。父母外出务工,将子女留家里由祖辈看护,这是农村留守儿童成长的特殊现实背景。

一般来说,个体早期社会化需要社会为其提供适当的条件:一是相对稳定、统一的价值观念和社会规范;二是令人敬佩的榜样或社会权威形象供以模仿。一般来说,当一个社会处于正常的发展时期时,可以为个人的早期社会化提供上述条件,而社会处于转型时期时,提供这种条件就受到了影响。首先是由于社会结构的分化,旧的规范逐步瓦解,新规范又尚未确立,导致新旧规范的矛盾对立,这必然造成社会规范和价值观念在指导人们思想和行为上的多元性和模糊性的倾向,使对各种社会规范缺乏理性分析和选择能力的儿童和青少年,在依据社会规范指导自己行为时陷入困境,表现为角色冲突和无法实现自我认同。其次,当早期社会化供以模仿的榜样或权威形象由家庭、学校和大众传媒共同创造时,由于各自的评判标准不一致,榜样的形象便遭到损害,它对儿童和青少年的心理影响和行为约束力无疑会降低,也很难转化为自己的信念和行为方式^[18]。

①家庭。转型时期家庭环境对早期社会化的不良作用有如下表现:教养不当,特别是随着独生子女家庭的增多,对孩子娇惯溺爱的现象十分普遍,使孩子养成了任性的习气,并表现出占有欲强烈和自私的个性倾向。由于父母特别宽容谅解的监督使孩子总能为所欲为,孩子并不因为违背规范而受到必要的惩罚,这样其越轨行为的重复率就会提高。由于婚姻纠纷而受损害、不稳定的家庭无法给孩子提供良好的模仿机制,也不能形成防止孩子违法行为所必需的父母监督和社会化条件,孩子要么因缺乏亲子间的交流而思想悲观,要么由于家庭的疏于管教而放任自流^[18]。

②学校。当前,内地学校的德育受到媒体、家庭和社会的冲击,难于对儿童进行主流价值观的影响,因此,学校传统的教育功能开始变小,教师对学生的权威地位也开始动摇^[19]。此外,内地学校由于升学和考试分数的压力,学校教育普遍存在重视知识教学和智育,忽视德育和思想品德教育的现象。

③同伴。同辈群体是儿童社会化的主要场所。儿童通过参与并认同同辈群体,通过群体间的社会文化传递促进其社会化过程。由于实行计划生育,城市以独生子女为主,农村多数为两个子女。因此,当今儿童的同辈群体是以家庭以外同龄伙伴为主建立起来的,彼此间的亲情、关心相对减少,血缘关系淡化^[19]。

(3)藏、汉族儿童生态环境的比较及其与规则意识形成的关系

从以上对藏、汉族社会生态环境的简要介绍来看,藏、汉族儿童成长环境的主要区别体现在以下方面。

从各自的区域性宏观环境来看,藏族儿童生活在一个宗教氛围浓厚、传统习俗影响深厚的文化环境之中,主流价值观、文化观念、行为规范较为统一、协调和稳定。而内地汉族儿童则生活在一个急剧变革、开放多元的社会背景之中,主流的社会文化思潮和价值观及行为规范与其他非主流文化交互作用,共同制约着儿童社会性的发展。

从家庭和社区环境来看,藏族家庭、社区的同质性强,更明显地受到藏族的宗教和传统习俗的影响,它们成为影响儿童社会化的核心因素。而内地汉族家庭间的异质性更强,有时祖辈与父母辈、父亲与母亲对孩子的要求也很不一致,对儿童规范教育和规

则约束方面显得更为宽松和灵活,缺乏整体的、一致的、稳定的要求。内地社区中邻里相对比较陌生,尤其是城市社区更是如此,并且互相异质性较强,儿童受社区影响相对有限。

从学校环境来看,藏区学校升学压力相对较轻,对学生的考试分数的要求也并不高,但学校与社区的联系更为紧密,家庭、社会的要求更易于进入学校的教育要求,从而对学生产生更为一致的影响。内地汉族学校升学压力更大,家长和社会对学生的学业成绩要求更高,学校对学生除学习外的其他要求相对较少,并且内地汉族学生利用各种媒体吸收新信息的机会更多,学校要求也常常受到其他因素的冲击甚至抵消。

从同伴影响来看,藏族儿童的同伴受家庭、社区的同质性影响较深,同伴交往更易强化家庭影响。而内地汉族学生同伴间的差异性更强,同伴间的交往往往成为抵制来自家长和教师等成人要求的因素,不利于成人要求的实现。

上述区域性宏观社会生态和微观环境对身处其中的儿童规则意识的影响应该是明显的。从研究结果来看,汉族儿童在规则认知维度上的得分显著高于藏族儿童,藏族儿童规则意识的总体得分和规则情感、规则意向的得分显著高于汉族儿童。这似乎可以从他们各自的社会生态的不同特点得到解释。

因为内地汉族儿童生活在一个比藏族儿童更多元、开放的环境之中;学校学业任务较重,学校的思想品德教育较为注重说理;本研究中内地学生有相当大部分是留守儿童,父母虽然与他们不生活在一起,但可以通过电话、书信等方式与孩子交流,对孩子日常生活和学习进行叮嘱。我们认为,这些因素也许是内地汉族儿童规则知晓、理解和评价方面显示出优势的重要原因。

但藏族儿童由于生活在相对封闭、单一和稳定的宏观社会文化生态和微观家庭、社区、同伴以及特殊的寺庙文化之中,成人对孩子的规范教育也许更多的是通过身体力行、榜样示范和潜移默化的熏陶、感染等方式来进行。儿童从小受到周围环境中成人在劳作、日常生活和宗教祭祀等活动中的言谈、行为样式的影响,耳濡目染,因此,一些基本的社会规范通过观察、体验、感染,更多地深入到儿童的内心世界中去,化为孩子们的心理结构和言行风格。他们也许对某些规范并不一定能通过语言接受和表达,

但他们在情感上更为积极,意向上更为主动和自觉,信仰上更为稳定和执着。

四 本研究的教育应用

根据本研究的结果,结合儿童规范学习的一般规律和原理,我们认为,在对儿童进行规范教育、培养儿童规则意识时,应注意以下策略。

(一)规则教育应全面把握规则意识的内在结构,注重知、情、意的结合

本研究认为,规则意识的内部结构应包含规则认知、规则情感和规则意向等三要素,我们采用验证性因素分析的统计方法,对规则意识的理论构思进行了检验,结果表明,该理论构想是成立的。因此,在规则教育实践中,教育者(家长、教师等)应注重儿童对规则的认知、情感和意向的全面培养,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导之以行。

(二)在多元价值观中梳理核心内容,培养儿童基本的是非观念和行为规范

在整个国家和社会进入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的全面转型时期,多元价值观的出现是势在必然,也是不可逆转的。尽管藏区与内地汉族地区在这方面有一些差异,但总体来看,现代化、多元化的潮流是客观存在的。但是,教育者,特别是学校教育工作者应该明确,社会价值观的多元化与主流价值观总体上应该是协调一致、相辅相成的,二者是辩证的矛盾关系,主流价值观应该是一般的、共性的,多元价值观应该是特殊的、具象的。教育者必须认清并认同社会的主流价值观、践行主流价值观,并以此教育学生,引导学生吸纳社会主流价值观,使之自觉认同和实践主流价值观。

(三)应将说理教育与活动、参与、体验相结合

规则学习不同于一般科学知识的学习,规则意识的养成不同于一般知识的理解和掌握,规则的遵守也不同于一般知识的应用。规则学习的特点决定了规则教育既需要晓之以理,更需要动之以情,还需要导之以行。从藏、汉族儿童规则意识三要素的差异来看,藏族儿童在规则情感和规则意向方面表现

出高于汉族儿童的特点,我们认为,这和藏族儿童所处环境中的宗教氛围的熏陶感染和对习俗的耳濡目染是有着密切的关系的。此外,在一些研究者看来,社会规范教育的实践合理性的重心在于通过协商博弈的方式,引导学生参与规范的制定,自主地解决冲突问题,在学校生活实践中生成规范、理解规范和运用规范,促进学生从他律走向自律^[20]。因此,我们认为,对儿童来说,同伴和班级活动中的平等互动,是培养他们主动参与规则制定、自觉遵守规则和监督规则执行的主要机会。教育者应有意识地组织集体活动,引导儿童参与集体活动规则的民主商议和制定,培养他们的自主意识和能力。

(四)充分发挥成人身体力行和榜样示范的作用

根据社会心理学家班杜拉的社会学习理论的观点,儿童的社会行为主要是通过观察模仿而习得的。在观察学习的过程中,榜样的特点是至关重要的。小学儿童认知能力发展的水平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模仿学习的重要性。因此,对家长和教师来说,在与儿童的交往中,应注意自己的言行,模范遵守社会规则,对社会上不守规矩的人加以批评,并在儿童的学习、生活中明确要求儿童尊重规则、执行规则。

(五)加强儿童成长各层次、各部分环境要素的协调,发挥社会文化生态的整合作用

从人的发展的生态学理论来说,儿童正是在与周围的不同层次的生态环境的互动中学习社会文化规范、建立是非观念和价值观,从而成为适应社会的人。儿童所处生态环境中各层次、各部分环境要素应是整合协调的,其传达的价值标准、社会规范应是一致的,这样,儿童的言行才会有稳定的参照系统和定向,而不至于迷茫、徘徊,不知所措。因此,父母对孩子的要求一致、家校配合与协调,对儿童规则意识的形成是至关重要的。此外,家长和教师还应引导孩子认识到社会上不守规矩的人给自己和他人带来的危害以及可能招致的后果。这种替代性的惩罚能在一定程度上给孩子以警示作用。

参考文献:

- [1]Bronfenbrenner U. Environments in development perspective: theoretical and operational models[C]//Friedman S. L., Wachs T. D., eds. *Measuring environment across the life span: Emerging Methods and Concepts*. Washington, DC: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1999.
- [2]郑晓明,方俐洛,凌文铨. 社会规范研究综述[J]. 心理学动态,1997,(4).

- [3]凌文铨,郑晓明,方俐洛. 社会规范的跨文化比较[J]. 心理学报,2003,(2).
- [4]夏玉珍. 社会规范是维持社会秩序的基本手段[J]. 理论月刊,2002,(2).
- [5]欧翠珍. 规则意识与宗教源流[J]. 广州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1,(4).
- [6]曹林. 中国人为何缺乏规则意识[N]. 中国青年报,2006-11-02(2).
- [7]夏玉珍. 转型期中国社会失范与控制[J]. 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2,(5).
- [8]饶世权. 当代大学生规则意识的现状及教育对策[J]. 青年探索,2007,(2).
- [9]李和民. 论大学生规则意识的培养[J]. 中国林业教育,2007,(1).
- [10]侯杰泰,温忠麟,成子娟. 结构方程模型及其应用[M]. 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1.
- [11]邱皓政,林碧芳. 结构方程模型的原理与应用[M]. 北京: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09.
- [12]丁芳. 一种正在演进着的人类发展观——人的发展的生物生态学模型述评[J].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09,(2).
- [13]德青. 藏传佛教戒律及其对藏族文化的影响[D]. 北京:中央民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1999.
- [14]高春玲,李雪竹. 迪庆藏族风俗习惯对其儿童社会化的影响[J]. 学前教育研究,2006,(Z1).
- [15]王冬兰,刘彤. 藏族传统社会宗教文化对儿童社会化的影响——一种文化人类学视角的分析[J]. 当代教育与文化,2009,(3).
- [16]吴碧君,陈昌文. “成长为宗教徒”——论藏族儿童宗教信仰社会化的模式与机制[J]. 贵州民族研究,2007,(4).
- [17]王慧敏,屈锡华. 一种榜样的缺席——藏区儿童早期社会化的境况[J]. 天府新论,2003,(5).
- [18]刘成明. 社会转型对早期社会化的影响及对策[J]. 青海社会科学,1999,(2).
- [19]谢晓蔚. 当代中国少年儿童社会化条件及新特点[J]. 江西社会科学,1999,(6).
- [20]裘指挥,张丽. 学校社会规范教育存在的问题及对策[J]. 教育研究,2010,(10).

The Comparative Research On Norm Consciousness of the Tibetan and Hans' Children and Its Inspiration to Education

FAN Chun-lin

(Faculty of Education, Sichuan Normal University, Chengdu, Sichuan 610068,China)

Abstract: It is the basic matter of children's social development, and also one of the successful symbol of children's socialization for children to form norm consciousness and the habits of complying to norm. According to the ecology of human development, individual's development is the result of interaction of individual and the ecology around the individual. In this research, the subjects are 349 and 541 pupils of grade 4, 5 and 6 respectively from the Tibetan and Hans' areas. Questionnaire survey shows: both the total point and the point of norm affection and norm will of the Tibetan pupil a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of the Han pupil. But the point of norm cognition of the Han pupil i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Tibetan pupil. To underst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hildren's norm consciousness and social-cultural ecology around them, the author, according to the ecological theories of human development has concretely analyzed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specific district macro-micro ecology of the Tibetan pupil and the Han pupil, the specific influence of ecology on the norm consciousness of the Tibetan pupil and the Han pupil. Finally, based on the results, the author puts forward the educational strategy about children's norm consciousness.

Key words: children; norm consciousness; ecological theories of human development; cross-cultural research

[责任编辑:罗银科]